

张光直学术作品集

# 古代中国 考古学

*Zhangguangzhi  
xueshu zuopinji*

张光直 / 著



张光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第一位在中国大陆提出“考古学中国化”的学者。本书是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考古学的重要著作，也是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本书以考古学为切入点，探讨了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本书是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考古学的重要著作，也是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本书以考古学为切入点，探讨了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本书是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考古学的重要著作，也是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本书以考古学为切入点，探讨了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辽宁教育出版社

# 古代中国 考古学


1982年11月

张 光 直 学 术 作 品 集

# 古代中国 考古学

张光直 著

印 群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中国考古学/张光直著; 印群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2

(张光直学术作品集)

ISBN 7-5382-6208-3

I. 古… II. ①张… ②印… III. 考古学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8807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397 千字 印张: 18½ 插页: 4  
印数: 1—5 000 册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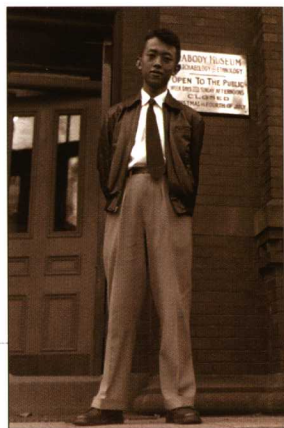
---

责任编辑: 柳青松 王之江 胡大为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封面设计: 杜 江

---

定价: 37.00 元

◎在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门前 [1955]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师生合影 [1952.4.5]

前排自左至右：谢剑、陶树雪、许世珍、李光周(?)、李亦园

后排自左至右：唐美君、陈楚光、高去寻、芮逸夫、卫惠林、张光直、任先民、丘其谦、林明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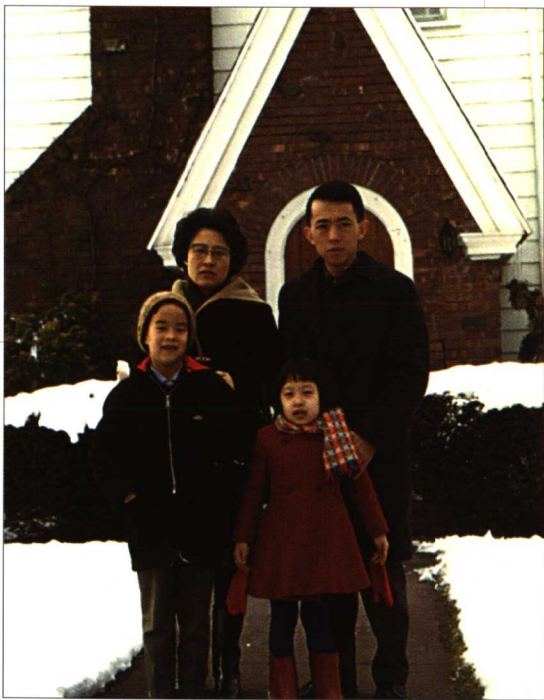
◎与李济在一起 麻省剑桥 [1957]



◎在台湾发掘大坌坑 [1964]



©在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办公室 [1982]



◎与家人在耶鲁大学自宅前合影(自左至右:  
张伯赓、李卉、张仲棋、张光直) [1966]



## 卷 首 语

50年代,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珍惜的财产之一便是 V. 戈登·柴尔德的《欧洲文明的起源》,该书是那个年代较进步的考古学著作。不过,麻烦的是该书的修订版不断出现,这对于一位收入不丰的研究生来说,一遍遍地购买同一书名的著作难免会囊中羞涩。最后,到 1957 年,我购买了柴尔德先生在当年去世之前的该书最后一次修订本,我自认为至少不必再买新的修订本了。然而,我错了。我虽然不必再购买戈登·柴尔德先生新的修订版本,但我仍不得不去买其他考古学家关于该课题的新版书。简而言之,教科书内容必须跟上田野发掘工作的进步。

这在中国考古学中更是非常正确的。当欧洲考古学至少已发展了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现代考古学仅开始于 60 年前,从那时起,考古学家们不得不与各种战争和动乱相抗争。仅仅是在近 35 年间,特别是最近 13 年里,如果说考古学在研究中国古老文明方面已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话,那么其结果是相对过剩的新考古资料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消化。本书的第三版著于 1975 年,

出版于 1977 年,距离本版本已有 10 年了。在这 10 年间,中国考古学进入了资料爆炸的时期。大量的新资料及其所揭示出的新问题使得以前的版本过时了。

既然《古代中国考古学》的本次修订版已属于从根本上重写,那它与以前的修订版相同之处甚少。其中,首要的变化是在本次修订版中,我不再倾向于论述古代中国考古学的所有方面以及引用每一条最新可用的资料。我希望本次修订版能构筑出一个较灵活的框架,它足以容纳下 10 年所出土的新资料,而不必做根本性变动。另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本次修订版随文明的兴起而结束,不再包括公元前 1000 年以后非常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古代史。其原因在于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文明系列丛书中,已有三部书分别探讨商、西周和东周文明,这三部书都由我任总编。

本书的序言实质上是《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一文的再版,该文章刊载于《世界考古》(第 13 期,1981 年,第 156—169 页)。我感谢《世界考古》的编辑惠准我在此处使用该文章。本书跋的再版也征得了有关方面(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及其博物馆)的同意。

我要感谢许多人,他们帮助我使本修订版得以面世。首先,我感谢约翰·西蒙·冈吉海姆纪念基金会和全国人文学科捐赠基金的经费资助,这使我能够进行研究并写出这本书。近十年来,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全国科学基金和全国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保证了我在中国的研究,本书的每一行都与这种帮助分不开。然而,我在本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完全由我个人负责而与上述机构无关。

我的观点受益于中国的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的数量之多以至于无法在此逐个点名致谢。在近36年间,他们无私地苦干,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自身的事业,这赢得了我们由衷的敬佩与谢意。本书是献给他们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朋友及同事的帮助。我的研究助理珍妮特·基尔科·米亚莫特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并负责定稿后的手稿打字。南西·拉伯特——布朗负责所有新地图及插图。尼科尔·罗斯莫尼瑞负责大部分照片。希尔·伯吉尔负责护封上的半山陶罐彩色照片。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琼斯·斯蒂芬妮细心而聪颖地编辑了手稿。戴维·古德里奇编制了索引。我向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 中文版自序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这本书已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先后出了四版,四版的年代是 1963、1968、1977 和 1986 年;这本中译本是根据 1986 年第四版翻译的。近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很快,新的材料层出不穷,一本根据当年的材料所作的对中国考古的综合研究,过不了几年便被新材料赶了过去,便需要作大幅度的修改。所以这四个版本实际上可以说是四本不同的书。第四版是 1985 年底完成的,到今天又快十年了。这十年来又出了许多新发现,按说又该写第五版了。但是我目前没有写第五版的计划。一方面这是因为最近十年来考古期刊在地方上不断出新,我一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将全国考古出版材料收齐。另一方面也由于第四版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构架在今天看来还没有作基本上修改的必要。把第四版作基础,再把十年来出土的新材料择其重要的在适当的位置上插入,这本书还可以使用一段时期。在这篇序里面,我便想试试看将一些新材料稍作介绍,看能不能将这本中译本所代表的时代向前推进一些。

说到这本书的中译本,这本书为什么一直是用英文写的,为什么到今天才有中文版,这些问题都反映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的一些特征。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的初期,中国大陆的考古学者与国外考古界几乎没有接触,西方考古界在这几十年中在理论、方法、技术各方面重要的发明与发展,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可说是非常微小的。这些年中新发现的资料越来越多,可是对它们的研究和解释的方法,仍然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阶段,以用年代学(基于地层学和类型学)和古史分期(基于马恩的唯物史观)作框架来排比材料为主要的作业目标。在1962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书,综合建国十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这种方法作出来的文章和报告,在史前史和古史的发展变迁的程序和动力上,很少有新颖的见解,但在材料的提供上,是比较客观的。所以这三十多年中的考古期刊与报告,提供了大量的客观史料;这是中国考古界在政治挂帅的困境之下所做的积极贡献。

六十年代的初期,我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班毕业,写了一篇叫作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in China: A Study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1960)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所采取的基本方法论是五十年代在美国盛行的所谓聚落形态的研究法(the settlement patterns approach),这种研究法把考古遗址当作聚落看,将聚落当作社群看。用这种方法来整理考古资料,主要的目的是将“物”在概念上转化成“人”。所以考古学的“资料”就转化成人类学的“现象”。以人类学的现象作研究的基本材料,我们便可以直接地分析文化差异与变迁的程序和因果关系。我在这篇论文里,便除了将考古材料分类排比以外,同时讨论了文化

差异变迁的程序与因果关系。次年我便采用了论文的结论作为基本的框架将到 1961 年前后所有的中国考古资料作了一番整理,在 1963 年出版了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的第一版。这本书既是用西方的观点整理中国资料的一种尝试,它便成为全世界各区域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环节,所以它也就一向是全世界各区域考古学的基本参考书之一,也便是它一直用英文写作的原因。从第一版到第四版,这本书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基本上就是一个:那不断陆续出土的新资料,迫使我们随时检讨我们的解释理论,随时迫使我们将它修改、完善。例如第一版的解释框架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中原核心说。可是到了第四版,由于中原以外区域资料的大幅增加和这些区域很多文化被碳素十四定年特早,我们很自然地改用了区域多元性的新诠释。

就在八十年代的初期,由于一连串内外的因素,中国考古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产生重要程度不一的各种变化。1981 年的《文物》第五期发表的苏秉琦和殷玮璋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开始使中国考古学摆脱中原核心的窠臼,使区域考古和由之而来的许多文化演进交流等问题,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以后八、九十年代中一连串的考古理论书籍、论文的出版和翻译,如张忠培的《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载《文物与考古论集》1986),俞伟超主编的《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1989)、俞伟超和张爱冰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6)、北大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举办的“走向二十一世纪——考古学的学习、思考与探索”座谈会(发言摘要载《文物天地》1988:3)、南京博物院出版的《东南文化》中刊载的许多

理论性的论文(如 1992 年第二期中的《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张忠培先生访谈录》和李科威的《考古类型学的进化观与文化动力学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院考古部编《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1991)、蒋祖棣、刘英译 Bruce Trigger 的《时间与传统》(1991)、以及拙著《考古学专题六讲》(1986)等,九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工作者可以说是在考古理论和方法论上感觉十分饥渴的,因而在这种气氛与环境之下对于资料排比式的中国考古学的综合研究自然有不足之感。因为最近几年我出了几本中文书(除了上述的《六讲》以外,还有《中国青铜时代》一、二集),国内的读者对我的作品有一定程度的熟悉,所以对这本有长期历史的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便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我相信这本书的中译本所以在今天问世,是有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的。这本书包括的范围很广,处理的问题非常复杂,里面一定有许多错误和不妥之处,我希望国内的读者不吝指正。

上面已经说过,本书的第四版出版于 1986 年,它所使用的考古材料的出版年代到 1985 年底为止。自 1986 到今天(1993),考古出版品中又积累了七八年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照我的意见还没有影响到全书的结构,但在很多点和面上使我们对个别文化的了解,要丰富了许多。下面依原书的章目为序,将比较最重要的新材料略作讨论。

### (一)旧石器时代的基础

这几年来新出土和新发表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又有多处,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四川巫山(黄万波、方其仁等著《巫山

猿人遗址》，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和山东沂源（《人类学学报》，1989，4年）两处的猿人化石。

古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自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的发现（1929）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不论在材料的数量上还是它们的重要性上，都已达到不能不为世界上讨论人类演化史者加以郑重考虑的程度（见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中国远古人类》，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最近世界古人类学者两次座谈现代人类出现的理论问题（T. Akazawa, K. Aoki, T. Kimura, eds., *The Evolution and Dispersal of Modern Humans in Asia*, Hokusen-sha, 1992; R. W. Sussman, guest editor, "Contemporary Issues Forum: A Current Controversy in Human Evolu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95, no.1, 1993），在很多关键性的争论上，中国人类化石材料与研究都被学者举出来作为讨论的根据。

## （二）早期农民（8000—5000 B.C.）

全新世初期从旧石器的渔猎采集时代向新石器农耕时代的转变，还需要考古学家与许多自然科学家的进一步的研究，但近几年来在华北、华南都出了一些新材料。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较重要的新发现，集中在长江中游两处。其一是湖南北部的澧水流域（见《考古》1986年1期、5期；1989年10期），尤以澧县彭头山最为重要，其年代可早到公元前6000年以前，出土绳纹、刻纹的陶器和大量的稻米，是中国现知最早的稻米发现（见《文物》1990年8期）。比彭头山稍晚为石门皂市，再下去便接上下一个阶段的大溪文化。另一处是湖北西南部枝城市（原宜都县）的几处遗址，以城背溪为主（见《江汉考古》1988年6期及1991年1



期),也出有与澧水流域相似的绳纹、刻纹陶器。

华北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处。其一是河北省中部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见《考古》1992年11期)。这里出土遗物很少,只有陶片十五片、石骨角器四件和有人工凿孔痕木棒、木块各一件。陶片都是素面的,石器中有磨棒、磨盘各一件。同出的动物骨头里面,除了野生种类以外,有可能是家养的鸡、狗和猪。最重要的资料,是这个遗址的好几个炭素十四数据,都在距今一万年上下,是现有华北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华北发现另一处重要遗址,是河南省南部舞阳县的贾湖(见《华夏考古》1988年2期及《文物》1989年1期)。贾湖的遗物很像是裴李冈文化,但也有人主张应另立一个类型。贾湖的重要性在于它出土的器物所反映的在这个时代的文化的丰富繁缛。它有制作精巧的骨器,包括一件多音阶的笛子。随葬物中有龟甲,上面刻有似是文字的符号。除此以外,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山东临淄、章丘一带新发现的后李文化,似是比北辛文化为早,与裴李冈文化平行的一种新文化(《中国文物报》1992,6)。

在磁山文化以北,在年代上与磁山文化平行,但面貌与磁山文化迥异的一个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过去我们知道在所谓东蒙南满地区,即辽河和大凌河流域,在公元前五千年到三千年之间,这个地区已知道有三组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富河文化在西,老哈河与西辽河的红山文化在中,辽河下游以沈阳为中心的新乐文化在东(见本书图138)。兴隆洼文化分布在红山文化区域,但远较红山文化为早,目前定年在公元前五千五百年以上,与本